

元杨翮《佩玉斋类稿》的版本问题*

罗 鹭

杨翮,字文举,上元(治所在今南京市)人。其父刚中,字志行,元大德间仕至翰林待制,有《霜月稿》四十卷,今佚。杨翮初官江浙行省掾,至正六年(1346)官休宁主簿,历江浙儒学提举,迁太常博士。元末战乱,还金陵。约洪武年间卒。所著《佩玉斋类稿》,刻于元末,陈旅、虞集、杨维桢等为之序。此集通行本是《四库全书》本,收录各体文章97篇。然《四库全书》本不是足本,南京图书馆和台湾“中央”图书馆所藏清抄本中有三部属于另一传抄系统,比通行本多出27篇文章。目前,国内学界在使用《佩玉斋类稿》时,仍然认为该集只有通行本这一种版本,完全忽略了另一版本系统的存在。例如,《全元文》所据底本就是《四库全书》本,失收足本中的集内文27篇。因此,有关《佩玉斋类稿》的版本问题,实有必要加以深入考察,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。

一、《佩玉斋类稿》编刻流传考

《四库全书》本《佩玉斋类稿》卷首依次有后至元二年(1336)九月陈旅序、至正八年(1348)春虞集序、元统三年(1335)三月吴复兴跋、至正八年(1349)十二月二十二日杨维桢序,均未提及《佩玉斋类稿》的刊刻情况。此外,清朱彝尊《潜采堂元人集目录》著录《佩玉斋类稿》有后至元二年曾荣序,此序今已不见。考杨翮至正六年(1346)官休宁主簿,集中文章皆作于休宁主簿任上及以前,从虞集、杨维桢二序可见是集的编成刊刻时间大约在至正八年(1349)左右。由于元末战乱,此集在明代罕见流传。翻检现存二十余种明代公私书目,皆未见著录。直至清初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才著录有元刻本《佩玉斋类稿》,然该元刻本已经亡佚,明清两代没有翻刻,故此书仅以抄本流传至今。

由于《佩玉斋类稿》不分卷,以文体分类编纂,在流传过程中随意合并或者分割,造成了卷数上的差异,人为地导致了版本的复杂。据调查,除去《四库全书》本外,海内外现存《佩玉斋类稿》抄本八部,主要有十卷本、十三卷本、不

* 本文系作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元代印刷文化与文学研究”(11CZW036)和教育部课题“元诗接受史”(09YJC751065)阶段性成果。

分卷本等分卷方式。

1. 十卷本(甲)

《四库全书》中收录的《佩玉斋类稿》来源于“两淮马裕家藏”本,是十卷本,即卷一至二记、卷三至八序、卷九论、卷十题跋、乐歌、启、箴,共收文 97 篇。此本在民国时编入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》,与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成为目前最通行的版本。但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已著录《佩玉斋集》十卷,可见此种分卷方式来源甚早,刘兆祐认为“疑是明以后重编者”^①。

2. 十三卷本

《佩玉斋类稿》十三卷本,现存二部,即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抄本和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。十三卷本与十卷本(甲)在内容、篇目顺序上完全一致,不同的是将十卷本(甲)的第十卷析为四卷,题跋、乐歌、启、箴各为一卷。但这种分卷方式并不合理,因为题跋三篇,乐歌、启和箴各一篇,每卷篇幅与前面九卷极不平衡。

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抄本二册,半叶九行十九字,左右双边,无框格,铃印有“谦牧堂藏书印”、“谦牧堂书画记”、“徐乃昌读”。沈津有专文介绍,认为“此康熙抄本当为现存最早之本”^②。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著录于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,有丁丙跋,称“写缮极精,可供参校”^③。

此外,清王闻远《孝慈堂书目》、汪远孙《振绮堂书录》也著录有十三卷本钞本,惜已亡佚。

3. 不分卷本

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著录有元刻本,不分卷。由于元刻本已佚,目前所知仅有钱曾简短的描述:“翻,字文举,以文类其稿,不分卷帙,元刻中之佳者。”^④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卷一〇八著录有影写元刊本,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,未见。从《皕宋楼藏书志》所录四篇序文的次序来看,应当与《四库全书》本是同一版本系统。

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抄本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为十二卷,误。此本分体编排,每卷卷端题“佩玉斋类稿”,次行题“上元杨翻文举”,次行题文体名,如“记”、“序”等,与十三卷本编次完全相同,但未标卷数。卷末有诸成璋跋:“右元杨文举《佩玉斋类稿》共一本,毛生翁借得,倩友人抄者。原写本业经刘良弼校过,尚多错误未改正。兹复检出,摘书于上。其可疑者,阙之。他日得善本,再校一过,庶无讹尔。道光十八年七月十八日璞庵诸成璋识。”铃印有“旧山楼”、“非昔居士”等,为赵宗建旧藏。

①刘兆祐:《四库著录元人别集提要补正》,(台北)私立东吴大学,1978年,第179页。

②沈津:《书城挹翠录》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1996年,第228页。

③丁丙: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三四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④钱曾:《读书敏求记》卷四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4年,第129页。

此外,上海博古斋2008年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第1288号拍品为旧钞本《佩玉斋类稿》不分卷本,半叶十三行二十三字,无边框界栏。此本与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抄本编次相同,未标卷数。

4.十卷本(乙)

由于《四库全书》本十卷本(甲)、清抄本十三卷本和不分卷本在内容和编次上都基本相同,因此,人们极容易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:同样是十卷本,另一种清抄本与《四库全书》本相比,在内容和编次上存在很大差异。有趣的是,南京图书馆藏有两部清抄本,分属两种版本系统:十三卷本与《四库全书》十卷本相比,虽然卷数不同,内容则完全相同;而另一种清抄本,虽然卷数相同,但内容和编次有很大不同。由此可见《佩玉斋类稿》在版本上的复杂之处。

《佩玉斋类稿》十卷、《补遗》一卷,清劳权抄校本,清丁丙八千卷楼旧藏。半页八行二十一字,无边框界栏,二册。内封贴纸,有丁丙跋,已载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,此不赘录。副页抄录《四库全书》本《佩玉斋类稿》提要,钐“四库著录”、“八千卷楼丁氏藏书印”、“学林堂”三印。卷首为虞集、杨维桢、陈旅三序。正文卷端题“佩玉斋类稿”,次行题“元太常博士上元杨翮撰”。钐“劳权之印”、“平甫”二印。卷一论、碑,卷二至三记,卷四至八序,卷九书、启、说、颂、赞,卷十箴、铭、题跋、墓志铭、祭文、乐歌,收文124篇,比通行本多27篇,内容相同的部分在编次上也稍有不同。卷末有吴复兴原跋。又有劳权跋,并过录朱绪曾跋。最后为《补遗》一卷,录文7篇、诗7首。卷中有朱、绿、黑三色批校,出于劳权之手。劳权跋云:

此从朱述之先生借钞。阁本缺逸,已据别本补完。述翁拟刊行其乡前辈遗集,此乃其一也。钱遵王有元刊本,不分卷数,乃是原本。传钞本类皆随意分析,故两本次第不同耳。平夫记。

朱述之即朱绪曾(1805-1860),字述之,号北山。上元人,与杨翮为同乡。清道光二年(1822)举人。藏书甚富,有《开有益斋读书志》六卷、《续志》一卷。此本过录朱绪曾跋云:

丁酉春,从文澜阁借钞。孟秋,又得旧钞本,因补足阁本之缺。旧钞本以阁本第九卷为首卷,今从之。碑、书、说、颂、赞、铭、墓志、祭文,俱阁本所缺。朱绪曾跋。

丁酉为道光十七年(1837),所谓“旧钞本”,来源于武原马氏,《开有益斋读书志》有更详细著录:“余见《佩玉斋类稿》凡三本:初从文澜阁传钞;继假汪氏振绮阁本十一卷,文无加增;后得武原马氏旧钞十卷,以论为首,较前两本多十之三。余更采《上虞水利序》、《白云稿序》、《续复古编序》、《杭州府学及嵊县学宫碑》、《陈少阳集跋》、《雅颂正音》所载诗,附录于后,而未已也。”^①武原

^①朱绪曾:《开有益斋读书志》卷五,《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》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2年。

马氏即马玉堂,字笏斋,海盐人,道光元年(1821)副贡。藏书斋名“汉唐斋”,皮藏孤本秘册甚多。

《佩玉斋类稿》元刻本不分卷,南京图书馆藏清劳权抄校本虽已改编卷数为十卷,但应当是目前最接近元刻本的一种抄本。台湾“中央”图书馆藏有同一版本系统的二部抄本,其中之一为邓邦述旧藏,系据劳权抄校本传抄,卷末过录有朱绪曾、劳权跋,又有邓邦述手书题记^①,邓邦述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》卷四有著录。邓邦述为民国时南京藏书家,与朱绪曾一样,皆曾计划刊刻《佩玉斋类稿》而未果。

综上所述,《佩玉斋类稿》的元刻本已经失传,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两个版本系统:《四库全书》本和武原马氏藏旧抄本。前者是通行本,为残本;后者是稀见本,也是足本。与《四库全书》本(十卷)属于同一系统的有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抄本、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(以上为十三卷本),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清影写元刊本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抄本、上海博古斋2008年秋拍卖旧抄本(以上为不分卷本);属于武原马氏藏旧抄本系统的有南京图书馆藏清劳权抄校本、台湾“中央”图书馆藏清抄本和旧抄本(以上为十卷本)。

二、《佩玉斋类稿》足本的来源与真伪

《佩玉斋类稿》足本来源于武原马氏藏旧抄本,有关该本的更早来源,目前尚未见到相关文献记载。但研究表明,该本比通行本更接近元刻本的原貌,内容更为完整,文献真实性也没有可以质疑的直接证据。

首先,从序跋与正文的编排次序来看,足本比通行本更接近元刻本的原貌。如前所述,通行本卷首有三序一跋,依次为后至元二年(1336)陈旅序、至正八年(1348)虞集序、元统三年(1335)吴复兴跋、至正八年(1349)杨维桢序,序与跋皆置于卷首,又没有统一的编排次序;而足本的序在卷首,依次为虞集《〈佩玉斋类稿〉序》、杨维桢《〈杨文举文集〉序》、陈旅《〈杨文举文稿〉序》,吴复兴跋位于卷末,这是符合序跋编排体例的。虞集为元代文坛巨擘,与杨翮之父刚中为好友,且《〈佩玉斋类稿〉序》几乎是虞集绝笔之文,在元代刊刻出版时理当置于卷首。至于正文的篇目编排,足本也更加整齐有序。通行本以《祈门县重修社坛记》为首,并无深意;足本以《汉高祖论》为首,包括五篇史论,与科举考试有着密切关系。其次为碑、记,是叙事性文字;序、书、启、说以议论为主;颂、赞、箴、铭为韵文;墓志铭、祭文和乐歌与死者及祭祀有关,这样的编排顺序符合各种文体的特点,也符合宋元时期的文章学思想。当然,足本和通行本一样,也有共同的缺点,即改编了原书卷数。《佩玉斋类稿》原本不分卷,足本和通行本都人为地改编为十卷,终究不是该书最原始的面貌。只不过

^①“国家”图书馆特藏组:《“国家”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(集部)》,(台北)“国家”图书馆,1999年,第98页。

相对而言,足本比通行本更接近元刻本的原貌。

其次,足本比通行本多出的 27 篇文章,应当是来源于元刻本。《全元文》搜辑有元一代文章,征引大量文献资料,没有收录这 27 篇文章中的任何一篇。笔者在元明清三代的文章选本、地方志、石刻文献、书画题跋、笔记中,也没见到相关文章被收录与转引。与此相对,朱绪曾所辑《〈佩玉斋类稿〉补遗》一卷,补杨翮集外文 7 篇,其中《〈桧亭集〉序》、《朱右〈白云稿〉序》、《戴九灵画像赞》已为《全元文》辑录,分别来源于丁复《桧亭集》卷首、朱右《白云稿》卷首、戴良《九灵山房外集》;另外 4 篇,虽然《全元文》失收,却也能查到文献来源,如《陈恬〈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〉序》,来源于陈恬《上虞五乡水利本末》卷首;《杭州路重建庙学碑》来源于《杭州府志》。因此,可以排除这 27 篇文章是后人重辑的可能性。那么,它们从何而来?《佩玉斋类稿》通行本只收记、序、论、题跋、乐歌、启、箴等七种文体,而足本编录论、碑、记、序、书、启、说、颂、赞、箴、铭、题跋、墓志铭、祭文和乐歌等十五种文体,比通行本多八种文体。据《佩玉斋类稿》卷首杨维桢序,至正八年,杨翮“获见予吴门次舍,示所著碑、铭、叙、志、箴、颂、论、赞,凡若干卷”。^①杨维桢序中所提及的碑、铭、颂、赞四种文体,不见于通行本,而武原马氏藏旧抄本则完整收录,可见该本就是这 27 篇文章的最早出处,其文献来源只可能是元刻本。

至于是否存在后人作伪的问题,目前尚未发现任何直接证据提出有力的质疑。该本作为一个流传有绪的善本,来源于武原马氏,很可能据元刻本传抄,经朱绪曾、劳权、劳格、邓邦述等著名藏书家、学者鉴藏,其真实性应当可以肯定。而且从这些文章所涉及的元代史实及其与杨翮的关系来看,伪本的可能性很小,下文将详述。

三、《佩玉斋类稿》足本的文献价值

《佩玉斋类稿》足本虽然并不是特别珍贵的文物性善本,但它的存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。它提醒我们,面对各种书目著录和各大图书馆收藏的同一部书的同一版本,如果没有逐一翻检原书,不能轻易断定它们在内容和版本上的异同。将这些看似相同、实则不同的版本的价值揭示出来,是学术界与图书馆界的共同任务。

《佩玉斋类稿》足本的重要文献价值,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。

1. 可为《全元文》辑补杨翮文 31 篇

《佩玉斋类稿》通行本编录杨翮文 97 篇,足本有文 124 篇,而《全元文》所据《佩玉斋类稿》的底本为《四库全书》本,完全忽略了足本的存在,因而失收集内文 27 篇:卷一《建德县三皇庙碑》,卷九《上王廉使书》、《上元宪副书》、《与吴录事书》、《上张中丞求铭墓书》、《上王敬伯侍御书》、《魏彦明更

^①杨翮:《佩玉斋类稿》卷首,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名说》、《杜母颂》、《嘉则颂》、《家庆图赞》、《玉函图赞》、《墨赞》、《瑞竹赞》，卷十《有恒心斋铭》、《潘以道古镜铭》、《鉴铭》、《万金铭》、《瑞竹铭》、《容安斋铭》、《府判孙公墓志铭》、《孔门豕妇杨氏墓志铭》、《唐子文墓志铭》、《祭太常博士韩公文》、《祭罗与可文》、《祭陶止善文》、《祭府判孙公文》、《祭李国瑞文》（代作）。另外，朱绪曾所辑《补遗》7篇中的4篇也为《全元文》失收，分别是：《陈恬〈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〉序》、《嵊县学记》、《钱舜举〈太湖赋〉跋》、《杭州路重建庙学碑》。以上合计31篇文章，约一万五千字，可补《全元文》之阙。笔者拟全文辑录，另予发表，以供学术界参考。

2. 为研究杨翮的家世生平提供新的史料

由于元末战乱，流传至今的杨翮家世生平资料极为匮乏。《佩玉斋类稿》足本中的部分文章，正好可以补充相关史料。关于家世，据《孔门豕妇杨氏墓志铭》，杨翮高祖始从浙江处州之松阳流寓金陵，占籍上元。祖公溥，宋乡贡进士，赠奉训大夫、徽州路婺源州知州、飞骑尉，追封上元县男。父刚中，以文学起家，终翰林待制、承务郎、兼国史院编修官。关于姻亲，据《府判孙公墓志铭》，杨翮之妻为集庆路总管府判官孙怡老之长女；据《孔门豕妇杨氏墓志铭》，其妹嫁龙兴路儒学正孔友益（为孔子后裔）。生平方面，虽然目前尚无法考知杨翮的生卒年，但《佩玉斋类稿》足本提供了重要线索。杨翮兄妹三人，同出吴氏，杨翮为长，杨牖次之，妹柔胜最幼，后至元六年（1340）卒，年三十一，据此可推其妹生年在至大三年（1310）。因此，杨翮之生年应当约在大德（1297-1307）年间或大德以前。仕履方面，杨翮历官江浙行省掾、休宁主簿、江浙儒学提举、太常博士，但具体任职时间，除官休宁主簿是在至正六年外，其余都不清楚，而《补遗》中的《陈恬〈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〉序》署“至正二十二年龙集壬寅十二月朔，从仕郎、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杨翮序”，《嵊县学记》作于至正二十四年九月丁卯，所署职名同前，可见至正二十四年（1364）杨翮还在江浙儒学提举任上，其时距元亡仅四年，故杨翮官太常博士应当是在这四年中。杨基《悼杨文举博士》言：“白发苍髯老奉常，乱离终喜得还乡。”诗中之“奉常”即指杨翮官太常博士。至于其卒年，约在洪武年间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《佩玉斋类稿》提要有考证，此不赘述。

3. 可增补元人传记资料的阙略

《佩玉斋类稿》足本中的三篇墓志铭，可以增补《元人传记资料索引》的缺漏，为元史研究提供新资料。除杨柔胜外，还有孙怡老、唐林二人。《元人传记资料索引》据《至顺镇江志》卷十六和《至正金陵新志》卷六，记载孙怡老传记为：“孙怡老，至大二年任丹阳县尉，迁句容主簿。”^①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传记资料。但《佩玉斋类稿》足本有《府判孙公墓志铭》，载其生平甚详：孙怡老，字友诚，占籍当涂。父炳文，登宋进士第，入元累授朝列大夫、江州路治中，改忠州

^①王德毅等：《元人传记资料索引》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879页。

知州。孙怡老以父荫补授漳州路盐仓副使,以忧去官,服除,再授丹阳县尉,调宁国路税使,升进义副尉、句容县主簿,迁平江路平准库使,转忠勇校尉、同知归州事,官终忠武校尉、集庆路总管府判官。至正五年(1345)卒,年六十有九,据此可推其生年为至元十四年(1277)。唐林是元代画家唐棣之弟,但《元人传记资料索引》虽有二人同名“唐林”,但与唐棣之弟不是同一人。据《佩玉斋类稿》足本中的《唐子文墓志铭》,唐氏三兄弟之长为唐棣,字子华;仲为唐材,字子才;季为唐林,字子文。唐林卒于至正七年(1347),年五十二,可推其生年为元贞二年(1296)。唐林好作诗,有《冰壶集》,已佚,可补钱大昕《补元史艺文志》与雒竹筠《元史艺文志辑本》之阙。

除墓志铭外,其他文章也可提供一些传记资料。例如,杨翮之父刚中,《元人传记资料索引》仅称其“卒年七十四”,不知具体年份,而据杨翮《上张中丞求铭墓书》可知,杨刚中卒于后至元四年(1338)戊寅秋,可推其生年为宋咸淳元年(1265)。又据《建德县三皇庙碑》,辛淑,字仲刚,汶阳人,后至元五年(1339)由江浙行中书省掾曹任建德知县,《元人传记资料索引》未收录其人,等等。

总之,《佩玉斋类稿》足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,其文献真实性也无可质疑。朱绪曾称“翮集传元代金陵之文献”^①,揭示的是《佩玉斋类稿》对于元代南京文献研究的重要价值。随着研究的深入,其各方面的价值定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掘与利用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

^①朱绪曾:《开有益斋读书志》卷五。